

一冬

吊脚楼的风景



融水县,香粉乡,雨卜村,一串妩媚摇曳的名字,也是我们今晚的宿营地。

从柳州一路向西北走,全国百家报纸副刊的记者们一路上沉迷在苗寨秀美的风景之中——远处是喀斯特地貌的重重山峰,脚下一条融江清澈如歌。虽说已是11月份,这里依然树木葱茏,花草芬芳。遮天蔽日的竹林浸润在绵绵细雨中,水雾迷蒙,那一片片依山而建的吊脚楼,藏在古朴的黑色屋顶下,烟雨中,令人遐想。

傍晚时分,阵阵芦笙由远而近,我们终于来到了雨卜苗寨。

家菜:酸鱼、酸肉、酸笋、野菜、糯米饭……当然,少不了香甜的糯米酒。身着绣衣褶裙,佩着亮丽银饰的苗妹们把酒敬客——依照苗家规矩,苗妹看上了哪位阿哥,是要跺脚揪耳朵逼着他喝干杯中酒的。几位男记者就是这样被拧着耳朵,一杯接一杯地畅饮苗寨的盛情。“呀嘢——呀嘢——”欢快的叫喊声在苗寨荡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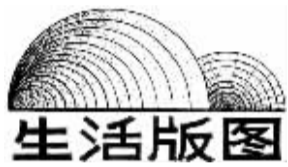
没想到,晚上安排我们住进了专为客人建的吊脚楼里,生平第一次住这样的木楼,心中充满了新奇。仔细端详,整幢楼全是木料,这在城里够得上是奢侈至极了。吊脚楼共三层,我和一位女记者住在下层的一个双人间。

房内,电视、电脑、电水壶一应俱全,还有卫生间及电热水器。与一般宾馆不同的是,走在木楼中,不论是你自己,还是屋外、楼上有人往来,鞋子与木板会发出呱呱呱呱的响声。楼屋里有老猫,因为窗子并不安玻璃,就有那风雾水气飘了进来与你亲近缠绕,还有淅沥的雨声、嘎嘎的鸭叫及远处篝火晚会上的欢笑声,人睡在木楼上如同置身于大自然之中……

清晨推开门,葱葱茏茏浓淡不一的广袤绿色,在我心中掠过一阵欣喜。雨雾绕青山,吊脚楼下的一潭碧水像是绿江江一块翡翠,吊桥影入水中悠悠颤动。桥边有一架碗口粗的墨绿色大竹,叶尖上水珠晶莹剔透。翠绿之

叶廷滨

细雨霏霏中的碉楼



往事像阴雨天里的蘑菇,一簇簇的,又分不清,于是你觉得自己是一棵老树了,老树与细雨也许就是人生一种境遇?

前年去广州,专程到开平去看过碉楼,那是上世纪初年,在海外发了财的华侨,回到故乡盖的洋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绝大多数人还在饥寒交迫中挣扎,“一个脚印里站三个贼”,富起来的华侨成了抢劫的对象,无奈之中,一幢幢富宅盖成了碉堡与洋房的结合体。这是建筑中的怪胎,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一个畸形的文化产物。如今开平的碉楼已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

与碉楼相似的建筑,我在童年时见过,那是在大凉山的西昌。我是1959年到西昌的,随下放的母亲从省城到了西昌。1959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反右”和“大跃进”的结束,以及“三年大灾荒”的开始。而对于大凉山则是解放军刚刚平息了彝族反动土司的叛乱,结束了奴隶制进行民主改革。关于这段历史,老作家高缨写过《达吉和她的父亲》,当年还拍了电影,故事是说一个被彝族土司抢去当奴隶妻子的达吉,终于见到了自己的汉族父亲。电影拍得还美,与电影呼应的,是我在西昌处处都看得见的高高的碉楼。西昌的碉楼与开平的碉楼无法相比,是典型的“土楼”。西昌碉楼有三四层高,每层只有一间房的大小。碉楼紧靠着老百姓平时生活的用房拔地而起。碉楼的地基是用石头垒起来的,石头地基上的墙体是土坯砌成的土墙。修建碉楼,为了防止土匪和山上的彝族土司,土匪抢物,彝族奴隶主抢人,抢去就当奴隶妻子。西昌现在是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在我到西昌时,还是汉族聚居地区,汉人生活在平坝里,彝人生活在四周的高山上。民族之间的矛盾深浅与冲突大小,可以从村庄的碉楼数目显现出来。童年时光,从大都市来到边地的碉楼,让我感到呼吸的空气都充满了恐惧。

这些石头和土坯建成的碉楼,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新奇,也因为高原的风雨让它们满目疮痍。西昌解放初期,民族间的隔阂还没有完全消除,但彝人土司下山抢劫的事情基本上没有了。碉楼没有枪炮留下的创伤,却经不住风雨的剥蚀,像一个苍老的守望者站在高原的阳光下。我常常着迷地望

李明

伞的故事

30年前的我还不到十岁,就记得上学时最怕下雨,好像雨还经常下。因为没有伞,下雨时我戴上草帽,披过塑料布,在泥泞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地行走。

家里唯一一把伞,是油纸伞,那可不是戴望舒笔下那巷女郎所撑的带诗意的伞。我家的伞,毛竹做的伞骨,黄油布的伞面,又大又笨,有点像现在买菜用的遮阳伞,力气小的人用它简直是个负担。妈妈让我用这样的伞,我也嫌它难看,死活不愿用。

家庭条件好的同学,有从外地带回来新

奇漂亮的伞。我们的语文课代表,是一个比较执着的人,也想新鲜一回。借了一把最漂亮的伞,去教师办公室帮老师做作业。他拿着伞潇洒地走出教室,可是无论如何用力,伞就是打不开。就举着伞在眼前,专注地研究,头发都淋湿了,还认真地对着人家喊:你家伞打不开。那个伞的主人,哈哈大笑,得意地接过雨伞,轻轻按动伞柄按钮,伞就啪的一声便打开了,原来是自动伞。

有一年,同学的哥哥从广州当兵回来,一身时髦的打扮。下雨时,用的是把折叠伞。只见他潇洒自如,从裤兜里拿出像杂志卷大小的伞,慢慢抖一抖,一下就把伞变大了。再一踩自行车脚踏,走了。我们几个好奇地跟着人家跑了老远,就想再明白,那伞到底是咋变大的。

现在我家的伞真多,单位一把、家里一把,还有骑车专用的雨衣雨裤,可不是不知为什么,老天爷却不那么乐意下雨了。

中国很古的时候,大约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一种名叫“比德”的理念,甚而演化成了习惯。不过那时的“比”,基本的意思是

指人从物的身上发现了美德,继之向该物学习。例如孔子就希望人们和松柏去比,学习“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精神。孔子也希望人们崇敬江河,学习它的“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的品格。屈原爱橘,写过《橘颂》,虽然主要意思之一是对青年人(包括屈原的学生)的热爱,但也希望人人向橘树中的美好品德学习。至于屈原在诗中对称草的赞美,尤其是对兰的赞美,更是后人皆知的。

几千年来,中国文人都有用某种物去比人 and 自比的习惯。如松、兰、竹、菊,如牛、马、鱼、雁等等,都是文人去比的对象。而且一切比,都有“比德”之意,赞美和学习的都是美物和美物身上的美德。大且丑陋或大凶残的物种,是不值得去比的。即使不丑陋、不凶残的平常之物,只要不能从此物身上提炼出美德属性,也没有去赞美或以此自比的价值。陶渊明对菊的喜爱,苏东坡对梅的喜爱,郑板桥对竹的喜爱,都是后人的谈资。

我在一个雨季住过碉楼,那是秋天收割庄稼的日子。秋天,西昌的雨季把这里变成了最冷的日子,我所读的初中,奉命下乡去支援人民公社的秋收。住进村里,生产队把我们安排在碉楼里,进入高高的碉楼,爬上扶梯,四周光线很暗,碉楼没有我们通常的窗户,只有五寸见方的“通气孔”,从里面能看到外面的情景,但小得连头也伸不出去。碉楼高也就不潮湿了。窗孔小,也就冷了,铺上一层干草,我们便打开背包,在碉楼里住下了。全国的灾害造成粮食的恐慌。西昌这个西南高原腹地的坝子,没有什么自然灾害,但要向灾区调拨粮食。粮要调走!这消息在农民中传开,出现了瞒产和隐藏粮食的事件。派我们“支援秋收”,就是在各个要害位置监督生产队“颗粒归仓”。却今难忘,我站在霏霏雨水中,头上戴着一斗笠,高高挽起裤腿,赤脚站在田埂上,看着农民在雨里收粮,脱粒,然后挑着一担湿漉漉的新谷子,送到粮站去。在送到粮站的水泥晒场旁有我的同学,在粮站收谷的水泥晒场也有我的同学,直到这些谷子装上“支援灾区”的大货车。

这是一个最漫长的雨季,那些雨丝一直停留在我的记忆中。这也是一串最漫长的夜晚,那些日子,在碉楼里睡觉和休息,没有电灯,昏黄的煤油灯也只在睡觉前点亮一会儿,滴滴答答的雨声没进梦境……

前两年,我有机会再次回到大凉山,我认不得眼前的西昌城了,这座高原小城变得和內地的城市一样。特别是那些石头和土坯砌成的碉楼从眼前的风景中消失了,消失得像梦,也像云。比起高原的云,碉楼竟然更梦幻。云彩虽不是当年的云彩,但依旧有高原云彩的风貌,形态万千,轮廓分明,变化无穷。而那些碉楼,却好像从来没有在这块高原坝子上站立过,只是在细雨霏霏的梦里,才那么亲切地成为记忆中的风景。

在中国,能活到百岁并作口述自传的人不多,而到了102岁还能每月写一篇杂文来思考新事物的老人,更堪称为凤毛麟角了。《周有光百岁口述》的传主周有光不仅仅是这般的少有的人瑞,也是一个真正从“传统”成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人。

周有光的百岁口述,从小时候常州的一个青果巷开始,大革命家蔡元培和白话语言学家赵元任居然都住在这个巷子里,而且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接着就是上海读书,负笈东洋,避乱四川,游历欧美,后归国任教,又奉调进京,从事语言改革工作,成为汉语拼音的创始人之一。尤其他述及与自己的妻子张允和以及张家“合肥四姊妹”,连襟沈从文等人的交往,从一个家庭生活变迁,折射出百年中国社会的缩影。故此,这部口述自传,是可以作为上一世纪中国文化发展史的一个侧影来读的。

其中最为重要的、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很多,比如他与爱因斯坦的两次交谈。但依笔者所见,老人干得最有意义的事情,应该就是他上世纪50年代对汉语拼音方案改革的划时代创新,即把英文的那26个字母用来表示汉语语音。就是这个拼音方案,让亿万中国孩子学会字母发声就能拿来拼音识字;即便是一个文盲,也能利用这个拼音工具走进中国文化的瑰丽宝库;还有,更方便外国人学习中国文化,即便是看不懂的中国方块字,利用拼音

中,河对岸吊脚楼的屋瓦越发黑得神秘。

吃过早饭,我们几个想去苗家“探秘”的人,冒着蒙蒙细雨乘兴去对岸。这才是真正地道的吊脚楼!与游客住的“联栋”不同,这是真正的“独栋”。

来到一座略显黑旧的吊脚楼前。一群安静的黄牛,用漠漠的眼神与我们沉默相对。我们踩着木梯上楼去走,一只黄狗懒懒地趴在楼梯拐角处,从它身边走过,竟没吭一声,似乎认定我们就是这家人的朋友。苗家寨这种不防设打消了我们的顾虑,径直来到了堂屋。主人姓贾,是一位中年男子,他正与老友亲坐在火塘边吃饭。见我们来,并无任何诧异,很自然地与我们聊了起来。他说,苗家的营生一是种水稻,二是放牛,日子倒也清闲。只是说起在外打工的儿子,他露出喜悦半半的神情,说如今年轻人都不愿蹲在家里,过年才回来看看。

寒暄之际,我们便开始打量这吊脚木楼。整幢楼屋是用木柱在平地上撑起,除了屋顶盖瓦以外,上上下下全部用杉木建造。用作立柱的大杉木凿孔,穿插以桁架斜撑,柱柱相连起楼,梁柱之间仅靠榫卯契合,十分坚固美观。我们不禁感叹少数民族这般心灵手巧的智慧。贾家这幢楼是上下两层结构,下层是

毛志成

真懂“比”吗?

有些物种,由于它平凡,司空见惯,不值得去大褒或大贬,这样的现象就更多些。凡是对某物给与特殊关注,也大都具有特殊的原因。

例如钱币这东西,本身无善无恶。也正是因为它无非是死物,本身不具有什么大善大恶之性,故而古代没有什么文人去写钱币形体本身的颂歌。一见了那东西的形体本身就觉得格外金光四射,灿烂辉煌,美如锦绣,那样的心态只能出在俗人身上而不应该出在雅人身上,只能出在病人身上而不能出在健康人身上。

但是什么样的物,包括无机物、非生物以及各式事物、人物,在性质上都有异化的

可能。眼下,流行的现代观念之一就是:由古时的“比德主义”演化为今天的“比物主义”。而其中所指的物,又不是松、兰、竹、菊之类,而侧重于指有市场价格的物,首推钱币。其实谁都知道钱币本身是死物,但它衍生出的东西却可能是最有生命力的东西。如地位、权势、头衔、名气等等,都是今天最热衷于去比的对象。不过比来比去,最深层的根子是比钱。比如说,一个真正的清官,恪守“诗能入画方为圣,官到穷时乃是清”的理念,理应值得赞美。但这位清官(也称领导干部)若是只凭法定工资吃饭,落得票子、房子、车子都很一般,同僚能看得起他吗?我看未必。连不少的平民百姓(尤其是小市

牛圈。上层因通风干燥,作为居室。中间照例为堂屋,设有火塘,是一家人吃饭的地方。周遭几间卧室,其中一间的房门紧闭,门上贴着刘德华的明星照,木板墙上满是彩影仙的各种奖状。一问,原来是贾家小女儿彩仙的闺房。看奖状便知小彩仙在学校里是个好学生,很让做家长的脸上有光。

吊脚楼之内远没有从外面看上去那样神秘,质朴得有些木讷的苗家味老(苗族对老人的称呼)默默无语,更没有给我们讲什么民族传说之类。但我知道,在这一片黑瓦之下,每天都有或悲或喜的时光流过。一曲流传很远的《我的吊脚楼》,就唱出了一个令人忧伤的故事。“情人啊,站在高山之巅思情情,情人啊,站在吊脚楼上盼姑娘。望穿双眼睛不来,姑娘啊,你今在何方?”故事中的少男在“文革”时代艰难,不得不远走他乡躲避灾祸,待他成人归来,青梅竹马的情妹妹已被洪水吞没,剩下的只是没有尽头的思念……哀婉的歌声,无妄的灾难,能不让人叹息扼腕?

苗家寨子的芦笙一次次响起,迎着来自远方的客人。可是,如今吹芦笙的人却不愿意留在家乡。在雨卜村,民俗表演开始之前,我跟几个吹芦笙的苗族小伙子聊天。他们笑

着抢着说,远道的客人都喜欢来这里,我们可都想出去呢。要不是村里搞旅游,让我们演节目,我们早都去城里打工挣钱了。我反问道:进了大城市不一定能挣到很多钱,也许还不如在家得意呢?他们说,那也得出去闯闯看看……正说着,表演开始了,他们几个轰地一下跑过去,加入围舞的行列。小伙子吹芦笙,姑娘打彩扇,跳起了苗家代代相传的古老舞蹈——扩放,扩放的,柔曼的,欢快的,乐声悠悠和着摇曳的舞姿。

我站在场外看,望着这些年年轻人黝黑的脸膛,好像跟贾家父子没什么不一样,只是他们说话时兴冲冲的眼神,飞扬的表情,要比那父子俩胆大和自信多了——不仅仅是年龄上的差距,这种急于出去闯世界的劲头,是父辈们不敢想的。而今在苗寨,眼光越过吊脚楼,不甘于后人,已是年轻一辈普遍的追求。远方的风吹来,给一个民族的古老舞步中加入了新的律动。今天,人们外出是为了打工挣钱,是去追寻自己的梦,再也不用不着提防、躲避无妄之灾的侵害了,也因此,寨子里的年轻人无所羁绊地走向山外边……我想起了贾家那个没照面的小彩仙,等到她们下一代长大的时候,吊脚楼上又该是什么样的风景呢?

民)见了这样的穷官,也很可能暗想:“真无能!你看人家有本事的官,哪个不是富得冒油!”

这样的比风,大有越来越普遍趋势。比如一个歌星、影星、笑星,“出场费”高低已经不只是才艺高低的证明,而是身分贵贱的标志。至于人格、人性、人品上的贵贱,似乎已经不是什么评定系数。

一个学者,一个作家,一个名教师或名厨师,是否真有名,往往先看他的职称,先看他的经济收入,特别是先看他的额外收入等等方面的高低。至于真实学识的大小,真实技艺的高低,尤其是真实德行的优劣,好像都不是主要去“比”的条件。“比”做为社会中的一种必要方式和手段,绝对不能废除!许多事物,也只有在比较中才能存在和认定。然而,关键是“比”的标准是真是假,是正是误!

俗话说:人比人当死,货比货当切。话虽苛刻,但也不无一定道理。不过,要是让真正有德有才的人被庸人或小人比死了,让货真价实的优质之物被假冒伪劣之物比得切掉了,这样的“比”,本身就当死,当切!

崔清林

拍客摄闻

2007年,购得数码相机。业余操作半年,笨不弃,见报30余张。拍照邂逅诸多稀奇,采撷一二记之。

“拍您广告吧?”见我镜头朝着竖于道边的巨幅地产广告,十字路口持小旗的交通协管员问。

“怎么了?”我移动着脚步,寻找着合适角度,回问。

见她欲言又止,我说:“我不稀罕它。拍它后面的老房子,听说快拆了,拍下留个念。”

看我不像房地产公司和广告公司的,她打开了话匣:“国家早就不许用繁体字了,可你看广告上‘龙’和‘圣’都是繁体。规定不让乱改成语,它还改,把‘成熟巨献’改成‘城熟钜献’。”这明显是在误导中小学生,咋就没人管啊?”

我心不在焉,敷衍道:“的确是误导。”

这位姊妹以为幸运知音,继续唠叨:“现在楼盘广告太夸张了。挖个小水坑就豪语人工湖,栽几棵观赏树就大言不惭森林人居,造个小假山就哄业主当山民。中国人建房偏起名啥哈顿、芝加哥……”

那天,路过一拆迁的城中村,我拿出相机取景。断垣残壁中立一孤店,女店主见状凑过来:“院儿里的吧?”我答:“不是。”

“你是新闻上的还是DV观察员?要是新闻上的,就给你说说俺家为啥不搬。”她说。“就算DV观察员一类的吧。即使媒体刊播了,也不见得解决问题。”我说。

“我不搬是有原因的!”

见她急切找人倾诉苦衷,我只好耐着性子站那儿恭听。

她家临马路有商店,店后是她女儿家院。她女儿嫌村里给的条件不合理,又不愿向掌权人塞钱。塞一两百人看不上眼,塞多了自己承受不起。因此拖了一年也未搬。电被村里掐了,就自己花3000元让电力公司通了她。

说完,她又说:没搬的都是外地来做生意的,当初900元一平方米买了村民楼房。现在村里拆迁,要么按原价补偿,要么面积“四折一五”,他们觉得不合理,就上省里上北京告。因为是小产权房,没告赢。村里断生活用电后,把早已弃用的无塔供水给他们接上,每天定时供水……



大学毕业生一开始要找的只是一个工作,而不是职业,更未必是事业 【漫画】赵春青

韩三洲

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也可以认识读音。可以说,汉语拼音好像是一座连接世界的桥梁,对中国人来说,是一座从没有文化到有文化的桥梁;对外国人来说,是一座中外文化交流沟通的桥梁。比如说在名片交流的现代社会,你把拼音印在自己名字的下面,外国人也能马上叫出你的名字来,这是一条多么便捷的中西文化交融的桥梁。由此可见,文字改革的重要意义,已经不限于文字本身,而是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了。

说来匪夷所思,周有光1955年起就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拼音化研究室主任,他的《汉字改革概论》一书,有几种译本,汉字拼音现在也风行世界,可作为1958年完成的“汉语拼音方案”的主持,他的专业竟是经济,而语言则是他业余搞着玩的,是一个对此有兴趣的外行。上世纪20年代初上大学时,周有光就对文字声韵有癖好,后来无论到什么地方,就一直中断对字母学的研究,而当文字字母学在中国则是无人问津的,没想到几十年后会派上大用场。1955年10月,上面让

时任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去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开会后就给留下专事文字工作了。从此,中国少了一个经济学家,而多出一个语言学家。书中这种偶然跨行成功的个人口述,读来也是那么生动有趣,给人启发。

古人有名句:“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对已经过了102岁的周有光来说,他每天最关心的还是眼下的家事、国事、天下事,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细读《参考消息》。他说,报纸你要要看,消息都在字里行间,不在标题上面。1988年,80多岁的老人就提笔了,自此开始打字而不用笔来写作了,比很多现代的年轻人还要前卫。当年他的老妻张允和女士,就是很靠丈夫的汉语拼音法,敲敲打打地编辑出只供张家兄弟姊妹传阅的、国内印数最少但后来又影响颇大的《水》杂志。回首百年,周有光的一生该有多少感慨,可喜、可愕的事情,但老人只用一句话就给总结了——“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资讯快递

陈铎朗诵音乐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张究)12月18日,由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民进中央文化艺术委员会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集朗诵艺术、电视音乐于一体的《陈铎诗歌朗诵音乐会》在北京举行。

陈铎是中央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从事电视工作50周年。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主持大型电视片《话说长江》以来,陈铎主持了《丝绸之路》、《话说运河》、《开发大西南》、《万里海疆》、《话说50亿人口》等著名专题系列

《圣诞传说》进入国内各大影院

本报讯 12月19日,作为今年最后一部进口大片,芬兰电影《圣诞传说》在各大影院隆重上映。芬兰电影《圣诞传说》11月在芬兰上映后,辗转美国、捷克、韩国、德国、挪威、瑞典、西班牙、加拿大、希腊等国,口碑极佳,这个温馨的奇幻电影以其感人的情节和优美的描述,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口碑和票房,近100个国家签下了《圣诞传说》的分销合同。目前,中国发行方对媒体公布了“中国特别版海报”,圣诞老人的红色着装突

出了温暖喜庆的气氛,届时大家可以在电影院提前享受圣诞节的欢乐气氛。

贺卡又到热销时

本报讯 时近岁末,手写祝福、传递真情的贺卡又开始热销起来。12月中旬已是邮寄贺卡的高峰期。据悉,今年销量有望超过2007年的3.9亿张。记者在邮政的贺卡专柜看到,今年贺卡的品类非常丰富,有普卡、信卡、贺卡型、自创卡、幸运封、动感型等六个类型,上百个图案,包容了传统喜庆元素、民俗曲艺、书画艺术、卡通造型等丰富内容。其中,今年推出的植物贺卡、刺绣贺卡、立体贺卡最受人青睐。无论是要用爱心浇灌的植物贺卡,还

是千针万线缝制的刺绣贺卡,抑或是动感十足的立体卡,都让人眼前一亮和爱不释手。中国、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家每年贺卡发行量都在数亿张。据邮政工作人员介绍,邮政贺卡不仅仅代表祝福和沟通感情,还具有传承文化、宣传媒介、收藏纪念等价值,贺卡兑奖活动已经成为老百姓每年春节的保留节目。如今,喜庆元素、书画艺术、名山名水、民俗曲艺、手工艺等传统文化融入贺卡,在表达祝福的同时,弘扬和宣传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时间)